

Theory of Culture Change:

The Methodology of
Multilinear Evolution

文化变迁论

Julian Haynes Steward

[美] 朱利安·斯图尔德/著

谭卫华 罗康隆/译

杨庭硕/校译



Theory of Culture Change:

The Methodology of
Multilinear Evolu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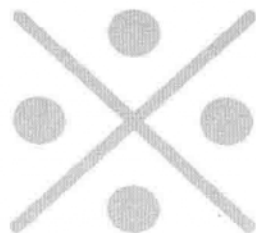
Julian Haynes Steward

文化变迁论

[美] 朱利安·斯图尔德/著

谭卫华 罗康隆/译

杨庭硕/校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变迁论 / [美]J·斯图尔德著,谭卫华 罗康隆译.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3.3
ISBN 978-7-221-10702-2

I. ①文… II. ①J…②谭… III. ①文化-人类学
-研究
IV. ①D127.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33596 号

Theory of Culture Change: The Methodology of Multilinear Evolution

© 1955 by the Board of Trustees of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Renewed 1983 by Jane
C. Steward

Reprint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Guizho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书 名 文化变迁论
作 者 [美]朱利安·斯图尔德
译 者 谭卫华 罗康隆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张良君 戴俊
装帧设计 曹琼德
印 刷 贵阳科海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710mm × 1000mm
开 本 16
印 张 14.5
字 数 220千字
版 别 2013年11月第1版
版 次 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1-10702-2
定 价 30.00元



吉首大学民族学研究文库

总策划:游俊

学术指导:杨庭硕

主编:罗康隆

“现代社会与人”生态民族学名著译丛

学术指导:杨庭硕

主编:罗康隆

编委成员:游俊 肖湘愚 龙先琼 钟海平 张良君

暨爱民 瞿州莲 赵树冈 吴晓 刘世彪

刘志宵 邵侃 覃娜娜 朱晴晴 袁理

李玲霞 吴合显

编者的话

大约五百年前,随着中世纪的结束和新大陆的发现,人类开始相继进入现代社会。“现代社会”之不同于“古代社会”和“原始社会”,不仅因为时间上更“近”,而且首先是人的生存方式与生活理念的更“新”。就后一方面而言,“现代社会”乃是欧洲人在最近四五百年间特别是最后一百多年来通过对世界的征服而形成的一种社会形态,是一种把“理性主义”、“人的主体性”以及“世界为一客观实在”作为基本生活信念的生存方式。这种理念和方式是前所未有的。

现代社会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体现于物质、制度和思想观念诸层面。其中,科学技术的进步所带来的变化尤为触目:自动化的机器生产把人从沉重单调的手工劳动中解放出来;石油、电力和原子能成为新的能源供给者;汽车、火车和飞机代替了过去简陋低效的运输工具;电子通讯(电话、电报、电视、传真等)不仅使人们易于获得信息,而且使遥远的世界近若比邻;农业机械的运用使过去分散的农业变成集约化的工业生产;化肥的使用极大地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生物工程技术的兴起和发展,不仅能按人的需要培养出新的品种,而且使复制生命本身成为现实;现代物理学、天文学已把人们的认识推进到层子(夸克)结构和一百多亿光年的遥远星体;电子计算机的研制和广泛运用,更是在人类生存的各个领域带来革命性的变化……作为这一切的结果,人们的生活变得方便了、舒适了、安全了。至少从总体上来说是如此。

“福兮祸所伏”。现代社会在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上虽然功不可没,但也同时造成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大机器生产和科层化的管理体系使人变成机器和制度的附属物;人口急剧增加,使本已紧张的物质资料生产更加紧张;与此同时则是自然资源的不断减少和生态环境的恶化;贫富悬殊非但没有消除,反而在不断地加剧;战争和冲突依然

存在,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给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带来了空前的灾难;旧的压迫和奴役形式消失了,新的又出现了;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金融风波使最隔离的地区也无法免其害;现代化过程中所滋生的急功近利和唯利是图倾向消解了传统的道德和人生的终极关怀……所有这些都使人在为现代社会的成就欢呼雀跃的同时又感到莫大的沮丧和困惑。

学术是存在的一面镜子。人与现代社会之关系以及人在其中的生存处境,包括他所取得的成功和所遇到的困难,必然会引起现代思想的关注与反思。西方学术也不例外。事实上,这种关注和反思还特别形成了现代西方学术尤其是人文学科研究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其观点之纷呈,学派之林立,实有使人目不暇接之感。其中虽难免片面与错误,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为了使中国读者了解西方一百多年来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为了向正处于自身理论建构中的中国思想学术界提供可资借鉴的相关材料,我们编辑了这套“现代社会与人”译丛。译丛围绕现代社会与人这个主题,精选名家名著或有重要影响的著作,分批陆续出版。从1987年至今,译丛已推出三十余种,广涉心理学、社会生物学、哲学人类学、宗教哲学、伦理学、文化哲学、心智哲学等领域,是国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唯一一套未曾中断过的译丛。译丛过去的成绩固然值得珍视,但还须“更上一层楼”。无论是选题的确立还是译文的质量,都还有需要改进的地方。除了译丛编委会和出版社的努力外,尚需广大读者和学界同仁的支持、建议和批评。

哀我中华,命途多舛。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的战舰和炮火,把中国这个古老的帝国卷入了现代社会。在经过长时间的拒斥、犹豫、推就之后,中国终于接受了现代文明的理念(远不完全)。正当她信心十足地奔赴现代化特别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的时候,现代化给西方社会带来的种种弊端似已尽显,现代西方的有识之士和后现代的思想家们已经早就在反省现代社会的种种问题了。在中国尚需赢获现代社会所有肯定性东西的情况下,中国人能从西方的成就与问题中学到些什么呢?在世界已开始由“现代”向“后现代”的嬗变中,正处在由前现代到现代之转折点上的中国人该如何来把握他们前进的航线呢?在全球已缩为“村落”、经济已一体化的今天,该如何调整我们的行为和观念并在这种调整中坚持那些为个人和人类所需的精神空间呢?要创造性地解决这些问题并非易事。但我们相信,本译丛所列著作,与已翻译过来的其他西方学术著作一样,定能为回答上述问题多少提供一些启发和帮助。

“现代社会与人”译丛编委会

2000年6月25日

总序

罗康隆

到了今天,民族学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其中的三大主题备受世人关注:一是文化与生态,二是文化的建构与社会运行,三是族际关系,而文化与生态互动共荣关系的探讨已经形成了一门新兴的民族学分支学科,即生态民族学。

生态民族学在国外的发展由来已久。20世纪中期兴起的新进化论学派开始正面涉及到了特定文化与所处自然与生态系统的互动并存延续,被提升为民族学研究的特定领域,从而开创了生态民族学探讨的先河。尔后,研究者层出不穷,研究机构亦如雨后春笋。相比之下,中国接受这一新兴学科的历程却倍感艰辛和曲折。时至今日,中国学术界对该学科依然缺乏整体性地把握,零星地介绍和在中国的研究实践都远远无法满足中国当代生态建设的需要。为了便于我国学人正本清源,从源头及其客观过程中去把握该学科,我们决定将国外有影响的生态民族学专著陆续翻译出版,以飨我国读者。

建设秀美中华已经历史的提到了我国未来发展的议事日程,但具体到生态建设中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我们尚缺乏可资遵循的指导。就这一意义而言,除了推动我国本土生态民族学的发展外,规范的翻译和推介国外已有的研究成果自然成了当务之急。本丛书针对这一紧迫需要,就我们的力量所及,规划出版了这套丛书,希望尽可能的展示生态民族学从发生到发展,再到繁荣的全过程,以推动我国与国外学术研究的接轨,以便健全与规范我国生态民族学的研究。

作为一门新兴的民族学分支学科,术语的规范自然很难一步到位,即令到了当代,国外对这一学科的名称依然纷繁复杂。除了生态民族学外,生态

人类学、人类生态学、环境人类学、生态社会学,乃至医学人类学、健康人类学等都在国外权威期刊中不断亮相,以至于中国学人,甚至在国外长期留学过的研究者都感到眼花缭乱、莫衷一是。这既是一个现实问题,又是一个亟待规范的紧迫需要问题。本丛书为了便于中国读者明辨国外有影响的经典名著在该学科发展历程中所处的地位,决议在我们推进的经典名著中,以“题解”的方式对其所用术语和学术思想做原则性的述评,重点提示该著作所用关键术语与相似术语的区别与联系,以利于我国学人的正确理解。待本丛书初具规模后,将尽快推出《生态民族学词典》,为我国生态民族学术语使用的规范化尽绵薄之力。

生态民族学研究的对象涉及面甚广,不同的国外经典名著所探讨的生态系统及相关民族文化各不相同,而其所形成的结论也具有不容忽视的针对性。我国读者如果没有相应的阅历和学科素养,那么就很难把握不同经典名著探讨对象的特异性。为了给中国读者排除阅读和认识上的障碍,本丛书推出的译本将以“注释”或“译后记”的方式,做简明扼要的生态背景提示,以免我国读者误解和误用。

民族文化是生态民族学研究的切入点和独特视角,但在具体的学科发展史过程中,民族学的先驱者们所做的民族志工作与生态民族学定型后,基于对“文化生态”的理解所做的民族志工作,其间并不具有必然的重合性,以至于中国的读者单凭一本去把握书中所讨论的民族文化会遇到很大的困难,甚至在工具书中亦很难查对。为了帮助读者排除这一障碍,本丛书所推介的经典名著也将以“注释”或“译后记”的方式,对该书所涉及到的民族文化做简略的说明,还尽可能提示该种民族文化与所处生态系统之间的衔接关系,以利于我国读者真正做到从“文化生态”观念入手,去把握来自国外的经典名著。

生态民族学的理论建构也有它自身的发展历程,不同的研究者对文化与所处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在认识和理解上也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其间既不乏精深的理解,但也肯定存在着过时的偏见。为了帮助读者尽快把握所推介经典名著在生态民族学发展历程中的地位与价值,我们推介的每一本经典名著都要辅以编译者的“序言”,重点提示所推介专著的时代及学术背景、所取得的成就与不足,以及在我国当代生态假设中的借鉴价值。由

于问题的复杂性,我们的推介当然会存在诸多的问题和不足,仅仅是考虑到有这样的推介总比让读者自己去摸索略胜一筹,因而才将这样的做法作为一种规制去加以推行,意在引导读者的阅读并接受读者的批评和指正。

随着中国的崛起,生态民族学的中国化也必然要提到议事日程,但这些工作做起来却倍感艰难,原因在于此前类似工作做得不多基础太差。事实上,生态民族学问世虽然很迟,但文化与生态之间的制衡互动关系在我国却是一个由来已久的思想观。其间的关键问题正在于外语基础好,对生态民族学理论理解精深的学人,往往对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认识有所欠缺,甚至对中国的文化生态实践也缺乏了解。这是客观社会背景所使然,短期内万难做得尽善尽美。可是,考虑到对国外思想消化和吸收的紧迫需要,我们在推介每一本经典名著之时,都将尽可能以“注释”的方式给读者一定的提示,希望我们的读者能够在这样的努力下,在关注国外学术成果的同时,不至于忘却中国自己的学术传统,以此避免盲目的机械搬用和模仿。

生态民族学与传统的民族志编写很不相同,它不仅是对文化生态共同体的如实整合和报道,更重要的还在于借以探讨人类社会与环境之间的哲理,荷载着不同文化的人群对所处自然与生态系统认识、加工与利用,行为主体虽然是人类,但生态系统显然不会遵从任何民族的理性。它有自己的应对范式,也绝不会遵从人类的意志。这就需要将文化与生态都视为具有自组织潜力的并行生命形态去考量。也就是说,生态民族学的核心命题——“文化生态共同体”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如果不揭示其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就很难达到准确把握事实真相的境界。然而,在生态民族学发展的历程中,每一个成功的研究者,哪怕是本学科权威由于受时代背景所限,就终极意义上说,都只能是在某一个侧面做出突出的贡献,得失利弊总是互见长短而已。为了避免对某一名著和某一研究者的过分倚重,我们在推介相应的专著时,都将尽可能对那些影响很直接的得失,以“注释”的方式做必要的点评,特别是揭示不同研究者在见解上的关键分歧所在。相信通过这样的努力,会更有助于我国生态民族学的健康发展。

作为一门新兴的分支学科,自问世以来除了专业的研究者外,还有不少从事其它领域研究的学人也会不同程度的触及到生态民族学的研究,其中一些非专业的学人所提供的资料和相应的见解还可能超越专业的生态民族学

工作者。为了尽可能的反映国外生态民族学研究的全貌,这套丛书除了全译推介经典名著外,还将选编生态民族学论文及相关著作的摘编,同时以“述评”的方式加以推介,务使中国的学人能准确地把握这门学科的发展历程、学术影响及其现状。

鉴于这是一项既至关重要,但又极其艰难的工作,我们尽管对整套丛书的规划做了力所能及的努力,但仍然感到力不从心。为此,诚挚吁请海内学人不吝赐教,帮助我们做好此项推介工作,也恳请有实力的学人参与我们的翻译推介工作,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使我国学者对国外的生态民族学研究不再很陌生,因为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事业。

中译本序

杨庭硕

朱利安·斯图尔德(Julian Haynes Steward, 1902 - 1972年)是民族学新进化学派的开创人之一。他的功绩是立足于20世纪中期对生态问题研究的前沿水平,将美国民族学中的弗朗茨·鲍亚仕(Franz Boas)学派和莱斯利·怀特(Leslie White)的进化论结合起来,以“文化生态”(cultural ecology)作为一个研究实体去探讨文化的变迁,从而开创了生态民族学研究的先河。其后,他的弟子们发展与深化了他的理论建构,逐步定型为生态民族学(Ecological Ethnology)这一全新的民族学分支学科。

随着生态民族学研究的深入和普及,其学术影响遍及了众多的学术领域,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研究方向。其影响所及无论是欧美,还是亚非,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出现了专业的生态民族学工作者,并组建了大小不等的学术团体。相比之下,正当这门学科方兴未艾之际,我国学术界却经历了一场重大的变革,连民族学学科都曾一度中断了教学与科研,从而使得中国学人在接受这一新兴学科时,被整整推迟了40年。直到20世纪90年代,我国才陆续有学者专业探讨生态民族学问题,相应的学术团体则迟至21世纪初期才开始组建。

同样因为学术背景所使然,我国翻译和推介斯图尔德《文化变迁论》(Theory of Culture Change: The Methodology of Multilinear Evolution)一书的工作也充满了曲折。20世纪50年代后期,林耀华在推介前苏联民族学理论时,已经接触到了生态民族学的某些问题,但当时的学者几乎没有意识到前苏联的这些学术思想与斯图尔德理论之间的关系。改革开放初期,林耀华也曾做过全面的规划,希望中国学人完整地翻译该书,但却因为难度较大,全面接受

斯图尔德的思想在当时还有一定的社会阻力,最终仅有王庆仁、玉文华等人将该书的部分章节翻译出来,并刊载于《民族译丛》等杂志上。至于全书的完整翻译工作,则迟至今日尚未问世,而我国台湾对该书的全译本却至今尚未进入中国大陆书市,这对我国生态民族学的发展而言,无疑是一个严重的欠缺。有幸的是,谭卫华、罗康隆两位博士耗时5年之久将该书全文译出,并对原书提及的关键理论问题做了注释和点评,以利于中国学人该书理论的正确把握。值此该书译本付梓之际,仅就该书中带根本性的几个问题做抛砖引玉式的推介。

该书书名称作《文化变迁论》并非随意之举,而是大有深意在其中。斯图尔德是想借此强调文化的演变不仅具有多线性,而且变迁的后果并不存在优劣之分,而仅是一些必然的演化结果,因而前人习惯所使用的“进化”一词带有明显的感情色彩。这不仅不符合文化变迁的实情,而且与鲍亚仕与梅尔维尔·赫斯科维茨(Melville Jean Herskovits)一贯强调的“文化相对主义”观相左。这就表明后人将斯图尔德理论称为“新进化论”或“多线进化论”,其实并不符合斯图尔德的原意。细读全书不难发现,斯图尔德的这一思想基本上贯穿了全书各个章节,他在书中甚至暗示即使是现代社会也不能称之为文化发展的巅峰。

书中的“文化生态学”一章在提法上也与此前的民族学习惯用语存在着极大的差异。近年来,我国学人在推介斯图尔德学术思想时较多的关注文化适应问题,但却很少正面介绍斯图尔德所理解的“文化生态”的内涵。在他看来,“文化生态”并不等于“文化+生态”,或者是“文化的生态”,而是指特定民族文化与所处自然与生态系统之间,经过长期的互动与磨合而形成的“实体”,并进而认为这样的“文化生态实体”才是探讨文化变迁的关键所在。这无疑生态民族学理论建构的基础,因而正确领悟斯图尔德这一思想内核,对中国生态民族学的发展至关重要。因此,该书全译本的出版,在这一问题上,无疑对中国生态民族学会起到关键性的推动作用。

书中有关“文化整合模式”的探讨,涉及到族际关系根本问题。其中,斯图尔德所称的国家层面的文化整合模式,就其实质而言与中国传统“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多民族国家治国理念,几乎可以说得上是异曲同工了。从这一认识出发去理解多民族国家的本质,理解费孝通所倡导的

“多元一体格局”，无疑会起到极大的启迪作用。斯图尔德为此而讨论到的很多个案，对我国当代民族政策的调整也有一定的参考借鉴价值。

斯图尔德对文化内部建构模型的观点，在我国早已为大家所熟知，但奇怪的是在斯图尔德的文化模型中，没有给各民族的知识、技术等文化事项安排一个特定的地位，这与他的老师莱斯利·怀特的思想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尽管在斯图尔德的书中也提到了不少有关各民族本土知识的个案，但没有把这样的文化内容纳入文化结构模型去加以考虑，因而总显得有些美中不足，这也是我国当代学人需要注意的事情。斯图尔德在书中对比了欧、亚、非三个地区的远古文明与美洲地区的远古文明，而且还专门提及了中国的古代文明。不过，就该书而言，斯图尔德对中国古代文明的理解显然有欠深入。对此，今天的中国读者大可不必意气用事，毕竟斯图尔德生活的时代，外国学人对中国的了解总体水平就不高，更何况当时还处于“冷战时期”。这样的不足恐怕得历史的对待了，但需要认真做的事情恰好是在这样的问题上与美国学人，特别是斯图尔德的后继者展开对话和沟通，让外国学人更多的了解中国文化。

总而言之，《文化变迁论》全译本的问世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它将有利于生态民族学理论的正本清源，也有助于生态民族学的中国化。为此，理应向两位译者致谢。

谨此序之。

2013年3月于吉首大学

序 论

1

在文化研究中,重要的是区别好科学的、一般化的方法与历史的、特殊的方法。前者试图把现象分门别类来辨认其前后一致的相互联系,建立规律性法则和形成有预见性价值的模式。后者更关注现象发生的时间和地点、各现象的独特性,以及反映其文化区(culture areas)的精神或价值体系。前者与后者的概念和方法必须有所区别。本书的目的是要形成一种方法论,探求以跨文化方式来揭示不同社会文化领域的形式、作用以及过程的规律性。

人类学在社会科学中能够独树一帜,主要在于它研究文化的历史法和比较法。它有双重任务:描绘在这个世界上发现的文化的多样性和解释它们的发展。民族志积累了大量关于人类不同种族习俗的资料,并且考古学与历史学已经共同重建了这些习俗在时空上的发生历程。然而,关于怎样适当地建构起对文化的“解释”,仍然看法迥异。由于以往的诸多概念,对于文化发展的性质持根本不同的观点,而这些方法也表示需要用不同的方式来看待文化事实。历史的或发展的解释都已经系统化,归纳起来有三种不同的方式。首先,所谓的“单线进化”(unilinear evolution)认为所有的社会都经过相似的发展阶段。因为当代各原始民族被假定为代表更高的社会发展阶段,认为他们展示了一种定式的发展。其次,与单线进化论者形成直接的对比,文化相对主义者(cultural relativists)认为文化发展主要是发散的(divergent),而且他们很关注一个社会区别于另一社会的特征。虽然他们对因习俗在文化区之内的传播造成的同一性^①或相似性给予大量的关注,但他们认为各个文化区之

3

^① 关于同一性(uniformities)和规律性(regularities),参阅 P88

间基本上是不同的。第三,多线进化(multilinear evolution)的地位(第一章)构成了本书的方法论,认为在相似的情况下文化的某些基本类型可能以相似的方式发展,但文化的各具体方面几乎没有以一种规则的序列出现在人类所有的群体中^①。

4 在这个世界的不同的地区,也许文化的模式和产生的相互作用关系构成了跨文化的(cross-cultural)规律性,这些都依赖于共时性(synchronic)和历时性(diachronic)模式。在一些个案中,由于某一现象会以其它的现象为出现条件,所以一系列的现象会重复出现。他们之间的关系与功能不需要根据历史变迁、时间深度、或发展过程来论述。这些规律是共时性的。在其它一些个案中,由于发展法则的缘故,一系列的相似现象会以一种规则的、先决的方式连续地出现。这些发展规律是历时性的,并要求对其过程进行论述。规律的功能或共时性模式将以分散的家庭群体为个案进行阐述(第六章),父系队群(第七章),混合狩猎队群(第八章)。历时性模式:以多氏族社会的发展(第九章)和水利文明(第十一章)为个案进行阐述。

为探讨跨文化类型,第一章到第五章系统阐述了一些启发性概念。第一章提出了多线进化的一般概念。肯定跨文化规律性的存在,但否认这样的规律性必然适合所有人类社会。这里提出的概念是要清楚地地区分于摩尔根、泰勒等经典进化论者的观点,区分于查尔德和怀特以及当代学者的观点。这些学者都根据普遍阶段来试图寻找文化发展的定式,但我的宗旨是要寻找文化变迁的起因。因为“进化”一词仍然带有强烈的十九世纪经典进化论的观点,考虑不想使用它,但是发现又没有更好的术语。

为了确认因环境适应而导致的文化变迁,第二章提出了一种方法。这种适应是一个重要创造性的过程,叫做文化生态学(cultural ecology)。一个将与社会学中“人类生态学”或“社会生态学”相区别的概念。在相似的环境里采取相似的适应过程的跨文化规律性是有效的,或是共时性的。

但任何文化对它的环境的调适都不会达到如此完美,以致于是静止的。

^① 我不知道“多线进化”这一术语的起源,它已经由威特弗格尔(Karl Wittfogel)使用过,与该书中的概念很大程度上相同。在美国政治和社会科学院年刊“列宁主义与斯大林主义对中国的影响”一文中,1951年9月,第22-34页,威特弗格尔使用马克思的术语“多元论”(pluralism)。

在文化发展的连续期间内,出现在任意一个地区的差异不仅涉及到复杂性或定量化新模式的不断增加,还涉及到定性化新模式。结果,二者从历史方面或更广领域来比较其文化生态过程的相似性,则必须认识到要和两个地区的较早时期相比,一个地区的发展晚期更接近另一个地区的相对晚期或相同时期。因此,不仅必须将文化发展作为不断增长的复杂性,而且应作为一连串的社会文化整合层次(levels of sociocultural integration)中的某种现象进行概念化。这一概念化在第三章将详尽阐述。社会文化整合层次的概念在分析复杂的当代社会体系的内部结构,以及描绘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定性化新水平连续产生时是有用的。第四章阐明这一概念对国家层次体系的应用。

文化类型的概念(第五章)根据前面参考中提出的二个框架来定义:文化特征源于共时性的、功能的、生态的因素,以及那些代表一个特殊历时性的或发展层次的因素。群体的跨文化规律因而被视为这些基本特征的周期性群体——文化核心(cultural core)——有类似的功能上的联系,起源于地方性生态适应和相同层次的社会文化整合。由于形式、模式或结构的截然不同,文化类型的概念面临明显困难。然而,既然不同的形式也许可发挥相似的作用,而相似的形式也许发挥各种不同的作用,我们就由此得出了形式—功能(form - function)的概念。

第六章到第十二章通过分析几种文化类型阐释了前面章节里提出的方法论。在以下的章节里,根据社会文化整合层次来描述这些文化类型。在第六章里描述生息在大盆地的肖肖尼印第安人的最低社会文化水平,证实了以家庭为基础的狩猎—采集社会。由于这个区域的文化生态适应排除了任何类型的长期多元家庭社会发展的可能,因此,单个家庭或核心家庭几乎进行着所有文化活动。

但在其它狩猎者和采集者中,特殊文化生态适应却导致了较高的社会文化整合层次。在第七章中分析了发生在世界的不同地区的几个父系狩猎队群的特殊条件而导致的较高社会文化整合的实例。第八章展示了在史前时期加拿大北部地区某些不同的环境因素是如何创造和适应混合狩猎队群的文化事实,并分析了欧洲后期皮毛贸易的发展导致了队群分化而形成家庭领地的历程。

许多原著民被分成数个非地方性氏族,而这些部分村庄或部落相互依

存。这比地方性的世系代表了更高层次的社会文化整合,并且他们可能已经以这样的世系为基础,在世界不同的地区发展了好几代了。在第九章就运用了从美国西南部获得的考古学和民族志的资料,以至少三个不同的个案,重构由地方性的世系独立发展来的多元世系的地缘组织(或农村公社)。

6 虽然某种生态适应产生了父系队群或其它社会类型,但几乎不存在社会变异。在某些情况下,文化和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允许在社会文化类型上有很大的或潜在的变异余地。如果这种变异余地有可能的话,历史因素也许可以确定这个社会的性质。在第十章中展示了作为英属哥伦比亚卡利尔印第安人的环境适应历程。首先,当他们在西北沿海环境因素影响下,如何从较晚的史前时期混合狩猎队群演变成具有地方性和拥有土地的半偶族和社会阶层体系;其次,近年来又如何转换成拥有狩猎领地的家庭单位,这种家庭单位代表加拿大较大的社会文化体系中的特殊亚文化群。

在埃及、美索不达米亚、中国、中美洲以及安第斯中部,以灌溉农业为基础发展了相对复杂的文明。第十一章展示了这些区域基本上相似的文化生态适应,都有相似的历史过程,即都是从一个简单的地缘组织(或农村公社)开始,最后都达到非常高的军事化大帝国的整合层次。尽管这些区域有许多不同,但文化特点之间的基本文化模式、形式和功能联系、以及发展过程都非常相同。

第十二章简要地阐明文化生态学概念的应用、社会文化整合层次的应用以及文化类型在复杂的当代社会波多黎各社会的应用。关于波多黎各的研究,即将另行发表,因为作者和其研究者发现这些概念是不可缺少的分析工具。

作者努力想尽可能严格地定义该书中提出的概念和方法。但忽视了社会科学方面许多正在发展的方法,这仅仅意味着那些方法对现在的目标来说是次要的,而不是意味着它们的价值是令人怀疑的。因而,虽然现在流行的文化和人格研究对个体调适问题很重要,但我无法看到它们与该书中探讨的根本问题是相关的。文化塑造人格,但从未有人提出人格影响文化。事实上,一种早先铸造的人格通常可能通过抵制创新来阻碍文化变迁,或通过修改文化的新模式给变迁指引一个特殊的方向,但这些都是短期变迁。在长时段的文化发展中,其根本模式和对应的人格类型不会永久存在几个世纪或上